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I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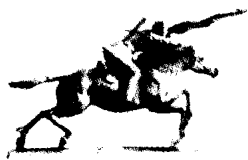
朱

光

自述



朱德自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自述/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3.1
ISBN 7-5033-1593-8

I. 朱… II. 中… III. 朱德(1886~1976)-自传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242 号

书 名: 朱德自述

编 者: 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

责任编辑: 郭米克

装帧设计: 多伶平面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岩梅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wyph.com>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593-8/I·1276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开篇自述·····	(1)
-----------	-------

附:关于朱德·····	(9)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诞生在琳琅寨下·····	(15)
--------------	------

开始读书·····	(20)
-----------	------

师从席聘三·····	(23)
------------	------

参加科举考试·····	(30)
-------------	------

上新学堂·····	(32)
-----------	------

教书不是出路·····	(37)
-------------	------

第二章 投身军界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	(40)
---------------	------

参加云南重九起义·····	(45)
---------------	------

北上援川·····	(50)
-----------	------

滇南边界游击战·····	(53)
--------------	------

护国讨袁之役·····	(56)
-------------	------

驻军泸州·····	(60)
-----------	------

护法战争·····	(63)
-----------	------

附:赠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诗文·····	(66)
---------------------	------

	逃离云南·····	(67)
	在上海会见孙中山·····	(69)
	附:在启程赴欧之前·····	(73)
第三章	天涯寻正道	
	去欧洲一路见闻·····	(82)
	留学德国·····	(87)
	附: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92)
	留学苏联·····	(94)
第四章	大革命中	
	策应北伐到万县·····	(98)
	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101)
	附:致孙炳文夫人书·····	(104)
第五章	保存火种	
	南昌起义·····	(106)
	南下受挫·····	(108)
	在困境中与范石生合作·····	(113)
	智取宜章·····	(116)
	打垮许克祥·····	(117)
	暴动烈火遍湘南·····	(120)
第六章	星火燎原	
	井冈山的斗争·····	(124)
	进军赣南、闽西·····	(132)
	第一次反“围剿”·····	(138)
	附: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	(140)
	第二次反“围剿”·····	(145)
	附:横扫七百里·····	(146)

第三次反“围剿”	(155)
第四次反“围剿”	(157)
第五次反“围剿”	(158)
第七章 长征两年	
开始长征	(160)
附:爱兵如子	(163)
同张国焘斗争	(165)
附:“临大节而不辱”	(169)
率军北上	(183)
从苏区到长征中的生活	(186)
到了保安、延安	(189)
附:朱老总和战士	(193)
第八章 跃马太行	
复我山河 保我民族	(196)
太行前线寄家书(三封)	(199)
为母亲度饥荒求助信	(204)
《重逢》	(205)
华北抗战的总结(节选)	(206)
附:朱总司令在太行山时的一些情况	(214)
第九章 延安岁月	
关于部队生产的一封信	(223)
给女儿朱敏的信	(226)
回忆母亲	(227)
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 生产的意见	(231)
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两次发言	(232)

附:周恩来为朱德 60 寿辰的贺词	(234)
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	(237)
我相信可以亲自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	(240)

第十章 走向胜利

关于晋察冀军事工作的报告	(241)
关于军工生产等问题的报告	(244)
关于准备战略反攻问题的信	(246)
视察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等地后的信 ..	(249)
我把功劳往下面推	(253)
打长春可强攻或长围	(255)
在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 ..	(257)
附:亲切的关怀,难忘的教诲	(266)
附:军事工业的奠基人	(279)

第十一章 心系祖国振兴

对美帝侵朝战争的对策	(284)
关于新疆工作几个问题的答复	(286)
加快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	(288)
兵工生产同民用生产相结合	(290)
提议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	(292)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	(293)
在七千人大会中的讲话	(298)
给儿子朱琦的信	(303)
揭发林彪的问题	(304)
附:最后十年	(307)
附:永记父亲的教诲	(312)

编后记	(327)
-----------	-------

开 篇 自 述*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马鞍庄。我家是穷苦佃农。为了一家二十口人的生活，我们租种了二十亩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姓丁的地主办的私塾。为了上他这个学，他要我交学费，还待我特别坏，就好像他是在办慈善事业似的。我食宿都在家里，每天要走三里地去上学。放学后，我还要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例如挑水放牛这类的事。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了三年。

后来，这个大家庭在地主的压迫下没法活下去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分了家。我过继给一个伯父，就跟着他到大湾去住了。我亲生的父亲对我很不好，可是这位伯父却像疼亲儿子那样疼爱我，送我去上学，学了六七年的古文。我是我们家惟一受过教育的，为了要上学，我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干各种活儿。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①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了六个月书，接着又在一所中学里读了六个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的一所体育学校里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家乡仪陇县，在县立高小教体育。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我才离开那里。我那时

* 本文是朱德一九三七年五月与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续西行漫记》。

注：①顺庆，今南充市。

的志愿一直想当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可能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要求很严格，所以我能被录取，感到很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听到织布的以及其他走街串巷的手艺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影响，那些人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了革命的想法，一九〇九年我进入讲武堂不到几个星期，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跟随有名的云南督军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以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同年，我被派往四川和清朝的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回到了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队长，在那里我教授战术、野战术、射击和步枪演习。

一九一三年，在蔡锷部队中我被任命为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去和袁世凯的部队作战。打了六个月的仗，我们胜利了。随后我升了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叙府和泸州。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部队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在当时是有些声望的。可是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作战中半个多旅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旧式军队作战。

一九二〇年年底，我回到云南府和反动派唐继尧作战，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对我有很大影响。是他第一个举起反叛

的旗帜,反对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保卫共和国的。

一九二一年九至十月,我当上了云南省警察厅厅长。那时,唐继尧卷土重来,他追了我二十天,我还是带了一连士兵逃了出来。另一个同伴也带了一连人和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受刑致死。我带领一连逃难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后来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了一下,然后进入四川。我先到嘉定,然后去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接待。一九二二年六月还和他们一道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军阀后来当然受到过红军的进攻。但是在当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我的人头,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刘湘所以对我为他效劳感兴趣,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我这一套对付专制军队很有成效的战术,主要是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我和军队逃兵纠合组织的流窜匪帮打过硬仗,从中学到的经验,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我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了我很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认为对于

指挥员和战士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这样，他们就会有为主义而坚决战斗的高昂士气——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乘了长江的船顺流而下，去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主义时期，前景是十分暗淡的，我感到非常泄气。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出来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药，一九二一年向西康进行第一次“长征”时开始戒烟，在去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已经戒得差不多了，在上海广慈医院又狠狠地治疗了一个星期，最后才完全根治了。

一九二二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在上海，我找不到共产党，因此就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寻找共产党。但是，在北京我的运气也依然不佳，仍然没找到共产党，于是，我又返回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

一年,我从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处乱跑,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似的。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荒唐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遇到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同旅行,他们的行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以后,我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九月,我乘船去欧洲,途经新加坡、马赛,然后到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照了一张俯瞰全城的照片,颇感得意。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到达柏林,当时我大约三十六岁。我一找到了党,便立即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

在柏林我呆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在德国期间,我坚定地干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政党,当时,学生分成了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我出席了世界学生大会。一九二五年,因与钱柯夫案件有牵连,被德国警察拘捕。钱柯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想在大教堂里炸死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人,其中有三个人是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遭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在柏林,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

是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的活动。第二次被捕只拘留了三十小时。因此,我为革命而坐牢的纪录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总共不过是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了那次的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我就到欧洲各地游历,去了苏联,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派我去指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部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我是杨将军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我当上了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由于杨森态度仍然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虽然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始终和北方敌人有联系。湖南的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就在这时离开了万县,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加入了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我帮着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任命为新九军的副军长,该军是起义过程中组成的,大约有三千人。国民党的第十一、第四和第二十军也参加了起义。

当时,我和周恩来、贺龙、张国焘、刘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以及其他革命同志等一同工作。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到后来才见到他。

我接着率领部队到了广东海陆丰附近的东江地区,我是革命军右翼的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和

贺龙进攻潮州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地区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然后转江西、湖南。到那时，我的第九军大部分弟兄都牺牲了。我只有总共一千二百个弟兄，其中包括许多从贺龙和叶挺部队败下来的散兵。

我接着参加组织一九二七年的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和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子上用了红星。六个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井冈山，部队增加到一万人。就在这个我们准备建立第一个根据地的井冈山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会面。

在湘南起义之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以前，我和毛泽东的惟一的一次联系是我从广东东江地区撤退之后，他派他的弟弟毛泽覃来和我取得联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和我把我们的部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时期是我们的革命堡垒。我被任命为第四军的军长，毛当政委。我们在井冈山上呆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想消灭我们的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之后也到达了井冈山。一九二九年，我们留他驻守井冈山，毛和我率领部队去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经历只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

至于我的私生活问题：在参加共产党的斗争以前，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过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一九三五年长征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了保全性命，已逃离住地——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

的纳溪。我这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有支持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十八岁，我二十五岁。我的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和我结合的，名叫伍若兰，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头。我现在的妻子是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结婚的。

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是不确实的。在云南我是有些财产，但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点。但是，一九二一年我被迫逃走时，我的财产全部被唐继尧没收了。

.....

我很佩服两个德国人——兴登堡和麦金森，后者是运动战专家。福煦将军在保卫法兰西方面也建立了赫赫功勋。当然，苏联的红军将领们现在都是有经验第一流的，例如加仑（布卢彻）。

在老派将军中拿破仑算是不错的。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他，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在中国，我一向钦佩云南的蔡锷，他是现代军事科学早期最优秀的专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敬服孙逸仙。

.....

中国士兵并不坏，是军官坏，不称职。中国士兵只缺乏政治训练。如果中国士兵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能吃苦，在精神和肉体上能忍受极大困难，要是在别的国家，早就丧失战斗力了，可是他们却能保持士气，正如中国苦力在吃苦耐劳方面是举世无双的一样。

附：

关于朱德*

不像莎士比亚，孔夫子认为名字具有头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这个名字上是这样。这个名字叫起来很响亮，英文里应拼做 Ju Deh，因为发音是如此。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许多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

*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

——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像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这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五十三四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李长林笑着告诉